



## ●武冈史话

## 蔡锷童年在武冈

萧泽曜

蔡锷(1882-1916)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和杰出的军事家。他的童年,是在武冈山门(今属洞口)度过的。

蔡锷父亲为蔡正陵(又名俊陵),母亲是王氏。传说他母亲快生他时,梦见山坡上有一虎从松林里出来,走近时却很温驯。不久蔡锷出生,因此喊蔡锷为“虎儿”,名“良寅”,字“松坡”。“良寅”的意思,取“良”为“山”、“寅”属“虎”义。蔡锷于出生后第二年,即他一周岁时由邵阳祖籍迁居武冈州山门王板桥(今洞口县山门区水东乡)。初居青山铺,第二年又迁至大坝上。1886年,蔡家又从大坝上迁往洪庙。

正陵初做裁缝,继做小贩,也曾教过私塾。蔡锷母亲在家,白天砍柴、磨豆腐、煮酒、卖饭,晚上则做针线活。蔡家居住的地方,门当山道,路窄崎岖,行走不便。特别是阴雨黑夜,行路更为艰难。为解决路人行走之难,蔡母常常搓草绳作“脚码子”,挂在门边,供路人取用,不收分文。又将杉木皮晒干,扎成小把放在门前,供夜行者取燃火把照路。蔡家卖饭,迟早多少听客便,饭钱不够的,少一些也就算了;没带饭钱的,可以赊欠,还来就收下,不还的,也不去追问。远近乡邻,都说蔡母是位贤慧的人。蔡母如此,与她的出身不无关系。蔡母两岁时,家人带她逃荒,成了累赘,于是将她捆在树上,大人们就离开了。幸亏有位王家老人路过,将她救下,抚养成人,也就姓王了,至于原来姓什么,无从得知。据说这位王姓老人,是洞口县水东乡柑子塘人。

蔡正陵和山门“路边刘家”秀才刘辉阁结为好友,幼年蔡锷常随父亲去刘家玩。刘辉阁见蔡锷智慧超群,甚为喜爱,就留蔡锷在刘家私塾伴读。蔡锷在山门读书时,博览强记,凡读过的书,均能背诵如流,一字不错;咏诗作联,开口即成,遣词典雅,寓意深刻。民间流传着许多关于蔡锷与人属对的故事。蔡锷13岁时,其父带他赴宝庆府应考。主考官湖南学政见蔡锷年龄小,出联曰:“邵阳考生八十名,唯汝最小。”蔡锷随即应对:“孔门弟子三千众,数回领先。”主考大喜,将蔡锷叫到面前,给了一张两寸见方的纸,令其写一万个字。蔡锷略一凝神,提笔往那一小块纸上写:“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主考高声赞叹:“此神童也!”于是,蔡锷以神童补县秀才。

蔡锷从启蒙读经到留学日本,他的学费、路费,都是刘辉阁为他承担。光绪三十年(1904)冬,蔡锷自日本学成归国,回山门探亲,履行婚约。当年刘辉阁许婚的,是哥哥刘蔡阁的长女刘长姑,而不是次女刘新英。刘新英自小死了母亲张氏,不得继母宁氏的喜欢,就由叔父刘辉阁夫妇抚养。蔡锷归来履行婚约,刘长姑已是30岁的人了!一种自尊基础上的自卑感,使她不愿嫁给蔡锷。此时刘新英已是20岁的姑娘,她不满姐姐的门户之见,在花轿临门时,她代替姐姐,嫁给蔡锷。蔡锷认为刘新英此举,既使且贞,给她改名“侠贞”。

(萧泽曜,武冈人,曾任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

## ●邵阳诗韵

## 名士风流雪峰间

刘宝田

明孝宗弘治年间,武冈岩塘(今属洞口)有诸生潘崇瑀者,与岷藩靖王朱彦汰结同年交。明世宗嘉靖四年(1525),参与朱彦汰谋事,事发革爵,隐居雪峰山东麓岩塘村,与靖王及当地名士游冶山水,唱和诗文。

潘崇瑀的《早行》一诗颇为清丽别致:“忙着游衣快着鞭,转头月挂柳梢边。两三点露不为雨,七八个星上在天。茅店鸡声人过语,竹篱犬吠客惊眠。等闲探出扶桑日,一卷画图在眼前。”

不是去办事,而是去闲游。闲游却不闲,兴致勃勃,早早便起,而且快快加鞭。这时,月亮正悬垂于西边柳梢,有点似露似雾的雨丝,湿漉漉的,几点星火朦朦胧胧,与垂月相映。薄明微凉,似幻似真,好一幅浓墨山水。接着用温庭筠《商山早行》的典故,为画面抹上一层荒古气息。这时,幽寂的画面里有声音透出,鸡声、人语,惊起犬吠,犬吠惊起眠客,深邃的画面中层次分明地显出一重重生机来。画醒了,夜也醒了,不知不觉旭日从迷雾湿气中钻出来,一卷清丽明媚的江山晨曦图呈现在眼前。闲游刚刚开始,就已经如此赏心悦目,接下去的行程还不知怎样消魂蚀魄呢。

潘崇瑀的《次靖王山中避暑》

一诗中多了一点议论,但“暑”却确实“避”得惬意:“炎蒸独爱山林幽,一洗尘襟万虑收。修竹不容三伏暑,香兰长占一潭秋。阮生傲世能青眼,杜甫忧时易白头。暂把竹床松下睡,清风一枕竟相留。”

说这个“暑”避得惬意,有两层意思:青青修竹,暑气消减;潭水如秋,炎暑远避;松风拂床,梦也清凉,周身浸泡在幽林凉境,暑烦全消。而且,置身清凉地,暑愁欲虑全被清凉涤洗,内心也轻爽、轻松。周身清凉,心中清净,身内、身外,如白云舒卷,竹风轻幽,这暑真是避得堕入了神仙境界,足显得儒雅风流。人生如行道,不能挑太多的东西,越走越沉重,最后气喘如牛,累得趴下。该放下的要放下,放下了就轻松了,自由了,愉快了。

潘崇瑀参与靖王谋事,自己没能放下,另一股政治势力让他放下了。放下了就没事了,反倒轻松了,病树前头万木春。避时序之暑,辟俗务之暑,像阮籍一样,见凡俗之士,白眼对之,嵇康携酒挟琴而来,则迎之青眼;而不再像少陵先生,忧时忧国,忧君忧民,见国破山河,城深草木,而“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说消极是有点消极,说失意也有点失意,但获得生命本体的大自在,人生行旅的大自由,像庄子一样,世界是自己的,何尝不是一种风流?

## 中国扶贫源起城步

周后平

“中国扶贫源起城步!”这一历史结论既有档案依据,又有生动故事。

城步苗族自治县档案馆有一卷档案被列为“镇馆之宝”,该卷档案有:胡耀邦批示的《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经济文化落后,群众生活困难》报告的影印件;欢送原国家地矿部派驻城步支教的讲师团的照片和欢送辞;一张讲师团成员领取伙食补贴的会计凭证;城步县委《关于以扶贫脱贫、治穷致富为中心,群策群力实现三年时间有个明显变化》的决议;城步成立县扶贫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等等。这些档案佐证了“中国扶贫源起城步”这一历史事实,当然更重要的是这些档案背后的故事。

1985年,原国家地矿部派出支教讲师团进驻城步,组长名叫于力平。支教之余,于力平与团队其他3名成员花了半年时间,沿着上世纪30年代地质学家李四光在城步找铀矿的路线,一路跋山涉水、走村串寨,深入苗民家中对城步的经济社会情况做了一次深度“体检”,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特别是这里的贫困状况让他揪心,于是他写了一篇调研报告,准备呈送地矿部领导。

按程序于力平先把调研报告呈送给时任城步县委书记的肖尊国阅审。肖尊国同志很重视,但为了进一步证实和更好说服其他班子成员,他召集了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武装部等五大机构的主要领导,发起了一场“城步边界行”。六七月间,他们绕着城步边境村,爬山、走路,15天里他们走进1300多户人家。这一走访,肖尊国心中有了

底,也动了情,“宁肯丢掉官帽子,不能让群众饿肚子”。他和于力平两人反复磋商,一篇有详细数据、有典型事例、有生动歌谣的极具份量的题为《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经济文化落后,群众生活困难》的“城步报告”诞生了。

于力平利用回京过春节的机会将报告呈送给原地矿部副部长温家宝同志,巧的是当时温家宝同志正调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温家宝同志深深地被报告所打动,立即将报告送给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王兆国。最后,这份“城步报告”刊登在国家信访局的内部刊物《群众反映》第十七期上,时间是1986年1月23日。

三天后,这份《群众反映》被送达总书记的办公桌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仔细地阅读了这份材料,饱含着对贫困群众深切的关怀,做出沉甸甸的批示:“兆国同志阅后,转湖南省委。从这个材料看,我们一些同志的工作太不深入了,应该从中得出教训,像城步这样的县湖南是否还有?请省委认真讨论一次,拿出切实办法。”这就是中国扶贫史上重要的“一·二·六”批示。

温家宝同志在《再回兴义忆耀邦》一文中记载,1986年2月3日,也就是在“城步报告”上批示之后的第8天,耀邦同志利用春节前后半个月时间,率领由中央机关27个部门的30名干部组成的考察访问组,前往贵州、云南、广西的一些贫困地区调研,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西南贫困地区之行,坚定了胡耀邦实施扶贫大决策的决心。

可贵的是,城步不是上呈报告了事,而是不等、不靠,积极先行起来,扎实开展全县的扶贫工作。1986年6月,全省第一次贫困工作会议在湘西凤凰县召开。“当年王震去过南山,红军留在南山的标语还在,这些历史都历历在目,然而几十年了,我们还是这种情况,对不起党,对不起革命的老前辈。”会议上,肖尊国用这样的开头开始了自己的发言。他第一个提出了“要建立专门的扶贫机构”的建议,同时就教育、医疗、供销、交通、水利、矿产等具体扶贫提出了“一揽子计划”。7月,城步县委召开五届二次(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以扶贫脱贫、治穷致富为中心,群策群力实现三年时间有个明显变化》的决议,在全县干部中开展“要使城步变,自己怎样作贡献”的大讨论。会后立即成立县扶贫工作领导小组,肖尊国任组长,实施“对口”扶贫,要求“一个机关要负责一个村,不仅要给它资金,帮它联络,还要想办法帮他们做点项目”,同时强调“三年没搞出成果就不要出来,不能提拔”。

就在城步如火如荼地开展扶贫工作半年后,1986年12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国务院成立专门工作机构,安排专项资金,制定专门的优惠政策,并对传统的救济式扶贫进行彻底改革,确定了开发式扶贫的方针。紧接着国务院公布了第一批全国贫困县,城步名列其中,自此,全国始有“贫困县”的概念。

(周后平,任职于邵阳市档案馆)



睡莲

刘玉松 摄

## ●品茗谈文

## 《古诗十九首》的人生主题

文晨熹

《古诗十九首》最早收录于南朝萧统《文选》,被刘勰誉为“五言之冠冕”。学界主流意见认为这是作于东汉后期的文人诗,这一意见证据较为充分,其说可从。关于这组诗歌的主题,古人曾有许多议论,论者多将诗歌与政治及士人出处相牵合。

笔者认为,《古诗十九首》作为一组诗歌,文本内部应当具有一定的共通性,其中贯穿的精神主旨似可视为主题所在。而贯穿于整组诗歌的就是对人生的感喟与思索,人生乃其根本的关心所在。笔者尝试从三个方面来阐述。

第一个层面,文士在诗中表达了他对人生真相的洞察。《古诗十九首》实际上是在谈论人生的痛苦。整组诗的开篇就是“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汉代士人为了追求功名,经常要游学、仕宦,由此导致的与亲人的分别往往长达数年甚至更久。因生离而造成的别离非人力所能及,但被迫与相爱的人分离则是人生莫大的无奈。这组诗对别离之情有生动的描绘和展现,充满了浓浓的感伤,感情基调低沉哀婉。其中,我们时常可看到

这样哀伤的叹息:“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音响一何悲!弦急柱促”“徙倚怀感伤,垂涕沾双扉”。可以说,这种低沉的情绪笼罩在整组诗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汉末士人的普遍心态。

《古诗十九首》的低沉哀婉基调实际上缘于汉末士人浓烈的生命意识,他们慨叹时光的仓促与生命的易逝,流露出对人生短暂的悲叹。这一点从很多汉乐府诗歌中也可见到。《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对人生有诸多比喻,如“远行客”“飘尘”“朝露”等,他们还以“涧中石”“金石”来作比,突出人生短暂。在汉末诗人的心目中,死亡是人生的归宿,活着是远行。这种浓郁的悲哀也影响了后世的诗歌。

第二个层面,《古诗十九首》表现了文士认清人生真相后产生的幻灭感。正如诗中所写:“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送,圣贤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人生短暂,如白驹过隙,圣贤亦不能例外。洞察了修仙长生为虚妄后,他们愈发想要去把握和享受现实人生。他们要饮酒,于是说“不如饮美酒”;要宴饮高会,于是说“极宴娱心

意”;要耳目之娱,于是说“弹箏奋逸响,新声妙入神”;要鲜衣良马,于是说“被服纨与素”“何不策高足”……总之,就是“为乐当及时”。及时行乐是他们的一致选择。他们对生活充满了热望,对享受人生抱有极大热忱。

第三个层面,文士在人生幻灭之后还要追寻朴素的人生。因为意识到了人生的有限和虚无,他们不再执着于遥不可及的不朽,转而去追求现实的人生。现实人生中安宁而平淡的日常,成了他们向往的心灵归宿。他们反复歌咏“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愿得常巧笑,携手同车归”“思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屋”。举案齐眉、长相厮守成为了文士最朴素、真挚的愿望。正因为这样,他们对离别尤为敏感,也对其进行了反复书写:“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独宿累长夜,梦想见容辉”“上言长相思,下言久别离”。离别的相思令人倍感痛苦,甚至催人衰老。从《古诗十九首》开始,中国文学中的离别书写始终充斥着悲伤的情绪,同时,离别也成为古代文学中的一个重要主题。